

大印古籍与科学普及

Publication of a Great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

孟凡茂

(北京矿冶研究总院, 北京 100044)

先举四则消息:①据《光明日报》广告,每套1200巨册,售价36万元的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开始征订。②据《经济日报》报道,精选1000多种古籍,投资1.5亿元,历时五年,简体横排的《传世藏书》已告完成。③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》。④1996年2月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。由此四则消息引出了本文的题目,同时也可看出大印古代典籍与进行科学普及两项工作上存在的差别。一项发起于学术界,继有海外华裔响应资助,几年时间,即有席卷全国、推向世界之势;另一项由中央号召,全国动员,历时一年多时间仍在务虚之中。而两项工作的作用上的差别更是显而易见了。前者不过是为极少数学者作为研究、储藏之用。后者关系到全民族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素养的提高。因此,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,古籍重印与科学普及的轻重缓急究竟在哪一方。

我国有重视文化典籍的传统。历史上,和平时期编订古籍总是作为一件经国大事来办的。明朝永乐时编成《永乐大典》。清朝乾隆时编成《四库全书》。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出了《四库丛刊》。如今,大印古籍之风又起。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编印古旧典籍是顺理成章的,那末,在讲民主和科学的现代社会,仍要继承甚至发扬此类旧日的传统,其实际意义是什么呢?今天还需要那么多的古籍吗?

历史上,我国有丰富灿烂的文化,也有令世界称誉的科技成就,但是,自然科学基础一直薄弱。自汉武帝废黜百家,独尊儒术,一直到清末,长时期的封建社会,思想观念上轻视自然科学,政治体制上排斥自然科学,使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处于原始知识积累的状态,没有建立起概括规律、合于逻辑

的理论体系,以致于现今中学所讲授的基本科学定义、定理、符号都来自西方。我国历史上没有为科学家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,没有进行科学教育的合理制度。即使近代科学在西方诞生之后,依然如此。乾隆时的《四库全书》可谓规模宏大,但国人不知英吉利发明了蒸汽机,俄罗斯建起了科学院。学者如纪昀虽学富五车,但不知有英伦三岛;硕儒如俞樾面对西方科技的发达,固守旧念,仍说“以拙制巧”。在西方科技蓬勃发展的18、19世纪,满清对儒家文化仍顶礼膜拜,崇古而不化,使科学发展停滞不前。时至今日,仍要以康、乾为榜样,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编印古籍,那科学普及和科技进步要等到何时呢?

我们更应当看到,在继承传统文化整理古籍的名义之下,许多历史糟粕,沉渣泛起,死灰复燃,一时间算命、占卜之书上市,建庙求神之风又盛。在人们头脑中尚属脆弱的科学观念很难抵御封建迷信的回潮,铺天盖地的复古浊流把科学普及挤到了尴尬的地步。屡有报载,科技场馆被挪作它用,科普图书销量下降,科教影片发行困难;而对于传统文化,一经提倡,便成夺人之势。如今我们听到了MTV大唱《千古孔子》,看到电视播放《易经文化》,不久还有《存目丛书》将问世。难道21世纪真是儒家文化的世纪吗?

我国尊孔读经2000多年,传统观念实已根深蒂固;引入西方科技只有百余年,科学基础依然薄弱。我们的科学普及工作实在亟待着力加强。我们难道不应该多介绍点原子、分子、DNA,少宣扬点五行、八卦、太极图吗?又何不多介绍些瓦特、达尔文、爱因斯坦,少印些佛典、道藏、经史子集呢?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